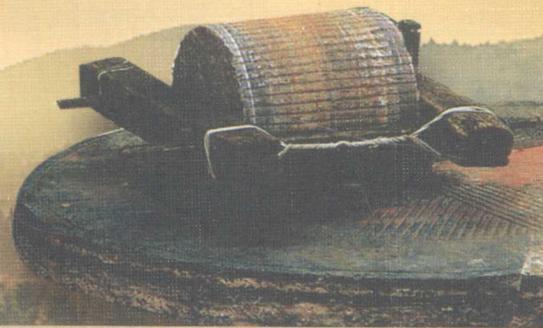




YINSHI WENHUA YANJIU



黎章春 著

客家饮食文化研究

客家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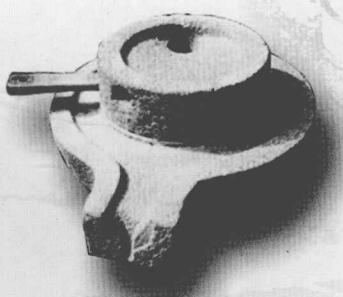
KEJIA YINSHI WENHUA YANJI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客家味道

客家饮食文化研究

黎章春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KETIA

YINSHI WENHUA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饮食文化研究 / 黎章春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207 - 08207 - 7

I. 客… II. 黎… III. 客家—饮食—文化—研究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2071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刘 鹏

【客家味道】

客家饮食文化研究

Kejia Yinshi Wenhua Yanjiu

黎章春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印 刷 哈尔滨太平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207 - 7/G · 1931

定 价 17.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中国自古就流传着“民以食为天”、“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名言。的确,任何人的生活都无法离开饮食,饮食既是人的生理需求,又是人的心理需求。

人类文明始于饮食器具的创造,人类的交易是从食物换食物发展起来的,文字的问世,最早的艺术,如绘画、雕刻也与饮食密不可分。世界人类学的开创者之一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7个阶段,其划分标准也多为重要食物原料的发现和饮食器具的发明。可以说,人类适应自然、征服与改造自然以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北京猿人用火熟食,拉开了世界范围内人类饮食文化发展的序幕以来,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已经有了数十万年,经过漫长的传承与创新,逐渐形成了以内容丰富异常、形式绚丽多彩为基本特征的态势。除了具有其他饮食文化所具有的“物态化”涵义外,还具有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文化”意蕴。

正因为如此,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深远。发现中国饮食文化世界价值的第一人是孙中山,他在其《建国方略》中写到:“我中国近代文明之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昔日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①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毛泽东也曾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一个是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都是中国的强项,不能丢^②。1990年12月8日,《经济参考》报道,“随着华人的足迹走遍世界,中华饮食文化的热风也吹遍了全球每一个角落。据统计,居住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约有3000多万人,约有16万家中餐馆。”美国有一家杂志曾以“哪个国家的菜最好吃”为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中国菜最好吃^③。由此可见,中国味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的诱人魅力,中国饮食文化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则显得较为落后。就古代而言,虽然不乏某些方面有深度探究的著作,如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著作、南北朝时的《齐民要术》、唐代的《茶经》、《千金要方·食治》、宋代的《山家清供》、元代的《饮膳正要》、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随园食单》等等,但总的来说显得零碎,不够系统。近现代这方面的研究,受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而时兴时衰,进展缓慢。当代饮食文化研究的兴起肇始于“烹饪研究”,是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餐饮业流行和技工

①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页。

② 转引自《卫士长的回忆》,《解放日报》,1989年9月1日。

③ 姚伟钩:《长江流域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学校需要的菜谱编写为契机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分别从民族学、史学、地理学等学科进入饮食文化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是,离实现建立完整的饮食文化体系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有学者认为,以前实行的学科分类体系将饮食文化研究归类在工业技术的烹饪法下,从而使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被肢解,“饮食之道”精华被遗弃,影响了饮食文化研究的学科地位,使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纵有重大成果也不能在学术建设中引起效应。近年来,世界学科发展的转折让饮食文化研究归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转折将有助于饮食文化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我们有理由说,对饮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独领风骚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知其无价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众所周知,中国饮食文明的大厦,是由各地域饮食文化共同构筑的,没有地域饮食文化作为基础,就没有光辉灿烂的中国饮食文化。客家是历史上,特别是唐宋以来以迁入赣闽粤交界地域的中原汉民为主体,融合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外来移民而形成的一支具有独特方言、独特习俗和其他文化特征的汉族民系。客家人创造的饮食文化传承了汉唐中原饮食文化的精华,历经千年发展和创新,其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是中国饮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近百年来,由于客家民系在汉民族共同体中的特殊性以及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突出贡献,国内外不少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专家学者对客家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研究,至今已出版专著近千部。其中,绝大部分涉及的是客家的过去,对客家民系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却探究甚少,对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更是寥寥无

几。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客家饮食文化专著仅见王增能著《客家饮食文化》一书而已。此外,部分有关客家研究的著作也对此略有涉及,如罗勇先生写的《客家赣州》、房学嘉先生写的《客家民俗》、黄顺忻等人主编的《客家风情》等。这种研究状况与客家饮食文化在客家文化研究中的应有地位实难相称,因为饮食文化是最具有大众性、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一种物质与非物质融为一体的文化。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客家饮食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大大丰富客家学的内容,为客家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添砖加瓦,而且使学术研究贴近社会现实,切实提升客家研究的社会价值,使客家学研究更有效地对接社会发展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相继在梅州、龙岩、郑州、赣州、成都、西安召开,客家文化的影响日趋广泛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客家饮食文化窗口之一的客家风味菜馆早已从客家地区开设到了非客家地区,甚至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以及海外呈拓展之势。客家菜以其古朴醇厚、山野气息浓郁、人文内涵丰富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2004年3月20日,中国烹饪协会在闽西长汀举办了隆重的“中国客家菜之乡”论证评审会。随后,赣州、梅州皆以打造“中国客家菜之乡”为目标,分别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首届客家美食精品大赛”和“客家菜双十佳”等一系列活动。赣南、闽西、粤东,按行政区划分属三省,但在地理和人文上却浑然一体,在客家饮食文化的形成、发展这一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上述三地的餐饮行业现状就整体而言却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同属一派饮食风味,却各自固守一方,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将是谁也难以做成像

前　　言

川菜、湘菜一样的大“蛋糕”。据测算，当今世界上客家人有 1.2 亿^①，其中有 400 多万人散居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②，以至于海外有“无客不成埠”的说法。许多海外的客家人本着历史上华侨爱国爱乡的优秀传统，或移资祖国、造福桑梓，或观光旅游、献计献策。因此，站在大客家，全国乃至全球的层面来研究客家饮食文化，共同致力于构建科学的客家菜系，打造客家菜系品牌，确立客家饮食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饮食文化中的应有地位，对于进一步促进海内外客家人士的联系和合作，开发并利用客家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促进客家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对客家饮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探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客家饮食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特色，提出了新时期进一步促进客家饮食文化发展的思路和具体对策。由于作者学术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欠妥或谬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8 年 11 月

① 罗勇：《赣州与客家世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69 页。

② 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06 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客家饮食文化的形成	(1)
一、客家的由来	(1)
二、客家饮食文化的形成	(12)
第二章 客家菜系与客家美食研究	(26)
一、客家菜系的架构与特色	(27)
二、客家名食考	(33)
三、客家特色家常菜	(67)
第三章 客家茶文化探析	(92)
一、客家擂茶、凉茶、绿茶与单枞茶	(94)
二、客家茶亭	(97)
三、客家采茶戏	(101)
第四章 客家酒文化探析	(107)
一、客家米酒	(108)
二、客家人的“做酒”习俗	(112)
三、客家酒礼与酒道	(113)

第五章 客家主食	(119)
一、稻米制品	(120)
二、杂粮	(130)
第六章 客家饮食民俗	(134)
一、节日饮食民俗	(135)
二、寿诞饮食民俗	(154)
三、婚嫁饮食民俗	(157)
四、丧葬饮食民俗	(162)
第七章 客家饮食禁忌	(167)
一、食品及其制作禁忌	(167)
二、饮食言行禁忌	(171)
第八章 客家饮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174)
一、客家饮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174)
二、打造客家菜系品牌促进客家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179)
参考文献	(185)
后记	(191)

第一章 客家饮食文化的形成

一、客家的由来

所谓客家,是指历史上特别是唐宋以来以迁入赣、闽、粤交界地域的中原汉民为主体,融合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外来移民而形成的一支具有独特方言、独特习俗和其他文化特征的汉族民系。19世纪初以来,因其自身的独特性,特别是其与政治的几度关联,客家民系或客家人逐渐为社会关注。

最早对客家予以关注者,当首推徐旭曾。徐氏曾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他有感于博罗东莞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的土客械斗,遂萌生了考察这支特殊民系的想法,终于在1808年写成《丰湖杂记》一书。书中提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开启了客家源流研究的先河。

19世纪下半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以及客家人在这次运动中的重大作用,加上广东发生更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客家问题一度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中外学者纷纷对其展开探讨。

20世纪初,国内有的教科书把客家人视为非汉族人,激起客家

人士的普遍不满。于是，有关的研究团体先后成立，阐述客家源流、追溯客家与中原汉族渊源关系的文章接连发表。在这种背景下，罗香林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写成名著《客家源流考》和《客家研究导论》。他运用大量的谱牒、史料，系统地研究客家渊源，得出了“客家为汉里头的一支系”的论断，并成为 20 世纪公认的客家研究最高权威。

然而，罗香林在客家血缘问题上的观点经历了由汉民与畲民混化到纯粹汉民的转变。1994 年，广东学者房学嘉先生著《客家源流探奥》，提出客家“即不完全是蛮，也不完全是汉”，而是以古越族后裔为主体融合少数中原南迁汉民的人们共同体。这是对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理论的全面挑战，令人耳目一新。《客家源流探奥》已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美国再版并在客家研究领域激起了较大反响：肯定的；否定的；大致相同的肯定；各种不同的否定。

其实，目前借以研究的史料、谱牒和考古文物以及现存的民俗大同小异，为何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研究结论呢？这里面涉及一个研究方法和视角问题。笔者试从如下两个全新的视角对客家源流予以探究。

首先，置客家源流问题于客家形成的地域之中，用历史眼光看待客家的主源。

赣南、闽西、粤东是现在客家的主要居住地区，也是客家形成的主要地域，掌握这一地域居民的历史变迁，自然成为探讨客家源流的前提。

北方汉人南迁之前，南方就有其土著居民，这些居民自春秋后期开始被史籍统称为越人。毫无疑问，客家形成的地域较早应是古越人的活动范围。然而，秦汉以前，这里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

程度决定其居民人数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存在一个庞大的土著氏族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呢?赣南、闽西、粤东同属中国南方典型的山区,山地、丘陵面积占各区总面积的绝大多数,都是各所在省开发最迟的地区。解放初期,上述三地仍有不少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而2000多年前的荒野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如今所能查到记载有关古越人活动的地域,几乎都是地势较为平坦、开阔的江河沿岸地区。《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七记载余干县:“本越勾跋之西界,……韦昭曰:‘干越,今余干县越之别名也,亦古谓越余地曰余干’。”余干县西北有瑞洪水,“为闽越百货所经,因置镇”。《汉书》卷一下《高帝记》有:番君吴芮“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的记载。据乐史称:秦时吴芮率百越部族参加反秦,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领兵归属。有关吴芮的活动遗址,散见今鄱阳湖地区。闽越的活动区域多在福建东北和东南沿海一带,而南越的活动则集中在番禹(今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古越人谋生于条件较差的山区自然是少数。

秦汉以后,隋唐以前,该地域的土著居民有多少呢?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该地域这一时期的行政建置可反映出大致情况。秦时,赣南设南埜县(南野),西汉时增设赣、零都两县,隶属于豫章郡,唐时发展为一州七县,即虔州领赣、虔化、南康、零都、信丰、大庾、安远七县。闽西设治迟于赣南,西晋始设县治,唐时正式置汀州,领长汀、宁化两县。粤东(梅州)在东晋时设立兴宁县,到唐时尚未设立独立的州一级建制。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人口是最基本的劳动力,也是官府征收赋税、徭役的主要依据。行政建置级别和数量自然是以一定的人口与经济文化为前提。由此可见,客家形成的地域原先人口基数是很少的,其数量是随着北方

政权统治的加强而逐渐增加,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势力不断向南扩张,从而与这里的山区逐渐被开发的历史发展同步。正如罗香林所说,西晋南朝直至唐以前,迁入赣南的北方汉民是零散的,且“人數无多”^①。

唐朝建立以后,汉族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赣、闽、粤交界山区的控制。于是,汉族势力与土著居民的冲突频繁而激烈起来。史书对该地域居民的活动情况的记载开始增加。这些记载尽管没有汉人和被称为俚、山越、蛮獠、徭、峒蛮等这些古越人后裔的具体数字,但可看到不同时期官府统计的总体编户数的增减:赣南的虔州在唐贞观时有 8994 户^②,开元时增至 32837 户^③,宋代元丰年间有 133929 户(宋代赣南分虔州、南安军,分别有 98130 和 35799 户)^④,崇宁元年有 310153 户(其中虔州为 272432 户,南安军为 37721 户)^⑤;闽西的汀州在唐开元年间有 4680 户^⑥,宋代元丰年间有 81454 户^⑦,庆元年间有 218570 户。^⑧;粤东的梅州在宋代太平兴国年间有 1577 户,元丰年间有 12372 户^⑨。上述封建社会官府统计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我们通过这些数字的变化,可以说明如下问题:一是客家形成的地域在唐宋以前不管是土著还是外来移民,其居民数量很少;二是唐宋以后该地域人口数量猛增,是接受大量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 24 页。

② 《旧唐书》地理志。

③ 《元和郡县志》。

④ 《元丰九域志》。

⑤ 《宋史》地理志。

⑥ 《元和郡县志》。

⑦ 《元丰九域志》。

⑧ 《临汀志》。

⑨ 《元丰九域志》。

外来移民的结果。以赣南为例,从宋代元丰初年(1078年)到崇宁元年(1102年)的短短二十四年中,户数由133929增至310153,净增了一倍多。这种现象,决非人口的自然繁殖所致,无疑是该地增加了大量外来移民^①。

唐宋以后,客家形成地域接受的大量外来移民是何许人?这需要联系当时全国形势来认识。唐后期以来,中原战乱不断,江南相对安定,所以中国的经济重心加速向南转移,人口的分布也因之呈南方比重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唐末的黄巢起义,对于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中原地区打击最沉重,一度形成了“大道俱成棘子林”,“百万人家无一户”^②的惨景。江南战祸较少,自然成为北方汉民逃亡的首选之地。唐亡以后,中原五代更替,局势动荡不安,特别是随着宋王朝的南渡,中原和前期迁到江淮地域的汉人进一步大规模南移。因此,唐宋以后,远离战乱中心的赣南、闽西、粤东山区居民猛增与上述社会背景是相吻合的。

如果说联系当时全国形势是一种宏观考察,那么,翻开现在客家的本本家谱、族谱进行探究就是一种微观考察了。家谱、族谱所记载的主要是某一姓氏家族的血脉来源、迁徙经过、支脉分化等重要问题,对研究客家先民南迁的原因、路线、移民规模及分布特点,具有其他材料所无法达到的功用。崇祖敬族、寻根问祖是客家人的传统,就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的今天也不例外。以客家先民较早进入的石城县为例,该县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者历时多年,对全县境内15个乡镇开展了族谱调查工作,发现县内尚存74姓族

^① 黎章春:《对客家源流研究的重新审视》,见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② 韦庄:《秦妇吟》,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谱,另有 5 姓族谱因“文革”、“破四旧”而焚毁。这 74 姓的现有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5% 左右^①。现存族谱资料显示和采用其他方法考证,石城的主要姓氏大多数是唐宋时期迁入的,其远祖几乎都来自中原^②。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列举了 19 个姓氏族谱,来说明唐宋时期客家先民南迁之众,其中到达赣南闽西的占 17 个,包括孙中山的远祖孙訓,也是这一时期迁入赣南的。

需要说明的是,大约从明代中后期起,山多地少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客家人口已达饱和状态,再也无法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客家民系遂有向外拓展之势。除了一部分向广东东南沿海、台湾地区及海外发展外,很大部分开始“倒迁”,即由闽西、粤东北向北迁到江西,再由江西辗转迁至今天的湖南、四川、广西和浙江等省区。笔者家族是明末清初从广东兴宁倒迁赣南的,但族谱明确记载本族郡望为陕西京兆郡。不可否认,有的谱牒资料有编造、杜撰的成分,为了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有的拉历史名人作宗,甚至拉帝王作祖。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绝大多数客家家族对于其远祖居地的记载。正如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说:“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唯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③

从以上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客家源流,不难得出客家的主源应是中原汉民这一结论。以古越族遗民为主体融合少数南迁中原汉民之观点,显然忽视了客家形成的地域自唐宋以来的居民结构中占更大比例的是南迁中原汉民这一历史事实。

① 潘昌坤主编:《客家摇篮赣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79 页。

② 温涌泉:《客家民系的发祥地——石城》,作家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15 页。

③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载《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其次,置客家源流问题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客家的主流。

客家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前面部分分析了客家的主源是南迁的中原汉民,那么,南迁的中原汉民与土著关系如何?进一步说,客家的发展主流是不是一种汉化趋势呢?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黄河流域生活着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部落,后来人们称之为华夏族。实际上,它是以夏族、商族、周族等为主体,再融合戎、狄、夷的一部分,经过夏、商和春秋战国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酝酿,至秦汉时期而最终形成的。汉代以后,华夏族逐渐演变成汉族。汉族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发展。在南方,经过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宋元时期多次波浪式加速推进,使汉民族在南方的分布地域从点到线,再由线到面延伸扩展,并以长江为纽带,最终把汉水、淮水、湘水、赣水、郁水以及珠江等流域连成一片。中原汉民南迁至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发展后,该地域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向,自然体现出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客家形成的主要地域都是纵横交错的大山、长谷、丘陵和盆地,这种地形决定了人口数量有限的古越族遗民分布必然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状态。据田野调查,由古越族遗民演变而来,宋明以后被称为畲族的该地域主要少数民族,现在往往是几户或几十户聚居成村,周围是客家人的村落,也有的村落客、畲人民杂居在一